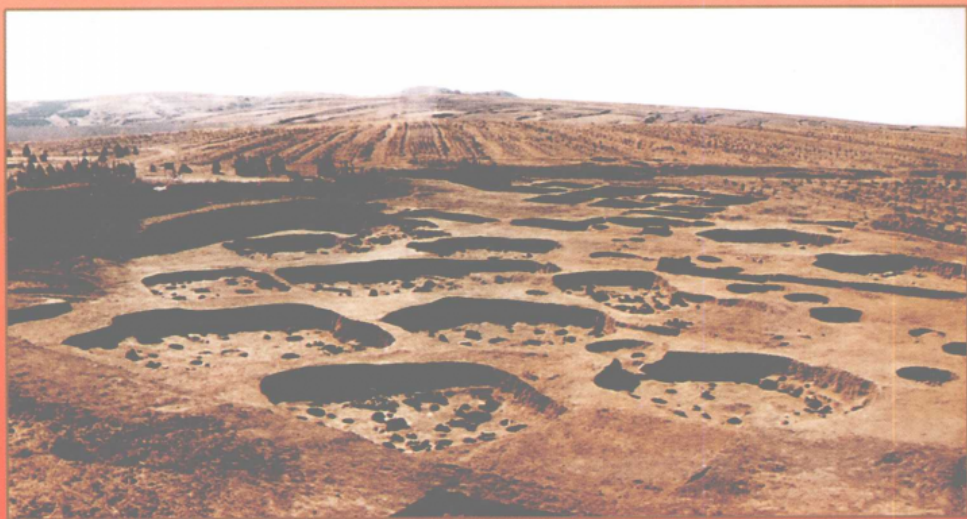


辽宁考古文集

COLLECTED WORKS ON LIAONING ARCHAEOLOGY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宁考古文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6

ISBN 7-80644-778-4

I. 辽… II. 辽… III. 文物—考古—辽宁省—文
集 IV. K872.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8534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20

字 数: 380 千字

插 页: 32

印 数: 1—1500

出版时间: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勇军

封面设计: 魏 凡 万雄飞 冯 雷

责任校对: 张启发

定 价: 80.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8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辽宁考古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任：王晶辰

副 主 任：田立坤 李新全 华玉冰

委 员：万 欣 朱 达 吕学明 辛 岩 杨荣昌

主 编：方殿春

执行主编：魏 凡

编 辑：吕学明 万雄飞 冯 雷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收录考古资料性文章 11 篇、学术论文 13 篇。反映了近年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切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果。作者主要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在职业务人员，还有曾合作过的省内同仁。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者及有关专业师生参阅。

目 录

我对东北文化区的认识（代序）·····	郭大顺（1）
查海遗址 1992 ~ 1994 年发掘报告·····	辛 岩 方殿春（12）
本溪南芬西山石棺墓·····	万 欣 梁志龙 马 毅（44）
辽阳青年大街发现的两座汉墓·····	王来柱（51）
桓仁米仓沟高句丽壁画墓·····	武家昌 梁志龙 王俊辉（58）
朝阳市衬布总厂的几座唐墓·····	万 欣 贾宗梁（75）
彰武朝阳沟辽代墓地·····	李宇峰 韩宝兴 郭添刚 张春宇 王庆宇（83）
北宁龙岗辽墓·····	张克举（112）
阜新四家子辽墓发掘简报·····	梁振晶（121）
凌源马家沟辽墓清理简报·····	吕学明 朱 达（134）
新宾赫图阿拉城内建筑遗址发掘简报·····	梁振晶 杨荣昌 沈永宝（142）
东港大孤山古代建筑群调查记·····	方殿春 李向东（153）
中国东北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时代及其特征·····	傅仁义（170）
红山文化玉箍形器考辨·····	吉向前（181）
东北亚地区短铤曲刃青铜短剑的年代与族属·····	王成生（193）
辽宁出土铜戈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王成生（217）
绥中石碑地遗址秦汉瓦当研究·····	杨荣昌 万雄飞（242）
试说秦夔纹大瓦当·····	王来柱（250）
高句丽初期都城考·····	李新全（254）
关于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基地的几个问题·····	田立坤（263）
鲜卑墓葬、三燕史迹与金步摇饰的发现与研究·····	万 欣（268）
朝阳古代鲜卑族颅骨的人类学研究·····	陈 山（282）
元代铜镜研究·····	刘淑娟（295）
谈绥中黑山头遗址的复原·····	张克举（310）

我对东北文化区的认识

(代序)

郭大顺

根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中国诸考古文化区系中,有一个东北文化区。

不过,我对东北文化区的认识很长时间里还是相当模糊的,经历了由不自觉地比较自觉的过程。1993 年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开馆时举办的“迎接二十一世纪的考古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文化交汇与中国早期国家》中,提出以考古文化特征划分三大区的问题,把以筒形罐为主要特征的东北区作为与以盆钵鬲为主要特征的中原区和以鼎为主要特征的东南沿海区相并立的三大区之一,但主要是从文化交汇及其相互作用角度认识的,并未触及东北文化区的一些实质问题,如对红山文化的经济生活,只提到农牧兼营类型,并未涉及东北文化区特有的渔猎经济。1994 年编辑《中国区域文化大系·东北文化》一书,由我写作的“绪言”一章,虽强调了东北地区经济类型的多样性和农、牧、猎在东北地区的南、西、东各有侧重的局面,但更多的是把东

北地区作为行政区划来看待,该书书名的副标题是“农牧文明”,说明当时的认识还未将东北地区从整个北方区中区分出来^①。

认真思考并在观念上有所突破是从讨论查海——兴隆洼文化经济生活开始的。以前多以为查海、兴隆洼这类遗存,应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日本学者秋山进午等坚持以采集和渔猎文化为主,其主要根据之一是从陶器上看到与日本列岛绳纹文化之间的联系^②。苏秉琦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二卷有关部分(张忠培执笔)也提出查海——兴隆洼文化已有农业,但并不占主要地位,采集狩猎仍是主要经济活动^③。在这期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中国考古学会的合作,使我们有幸看到日本一些典型的绳纹时代遗址并有兴趣翻阅一些有关资料,特别是1995 年应日本富山电视台内藤真作社长之邀对日本北陆和东北地区的考察,发现日本北部绳纹时代一些大型甚至特大型的聚落遗址和祭祀遗址,就是以发达的渔猎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如著名的青森县山内丸

遗址。看来渔猎经济也能维持大型聚落并可能跨进文明社会,这些都引起了我的重新思索。此后,先后应日本富山市教育委员会藤田富士夫之邀,写了《玉之路与绳纹人的文明信息》^④,应《北方文物》之邀,写了《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⑤,可以说对东北古文化区在认识上有了一次飞跃,主要是认识到红山文化属于东北文化区,红山文化之本应是渔猎文化,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史上先走一步是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结合的结果。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的这一认识过程,始终是在苏秉琦先生学术思想指导和启发下逐步有所加深的。1995年初在哈尔滨召开三省考古所长会议期间,较早倡导东北文化区的林沅同志^⑥曾问我,苏秉琦先生是如何看东北文化区的。带着这个问题,我回顾了苏先生的有关论述和日常谈话。苏先生在已发表的文章中是把东北文化区放在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系里论述的,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给了东北文化区以特殊重视。

早在1983年8月于辽宁省朝阳市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谈到朝阳地区在中国古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就曾指出:“朝阳是联结燕山南北这一大地区跟辽东、东北、东北亚广大地区的重要环节”,“东北西部,包括哲盟、呼盟,还有辽、吉、黑三省的一大块地方,谈到它们的古代文化,就不能不从朝阳地区谈起”^⑦。从1984—1986年的三年中,先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甘肃省大地湾和内蒙古包头市召开的

考古座谈会上,苏先生在论述中国北方考古概念时,将中国北方分为广义的北方和狭义的北方,提出东北和西北作为广义的北方的两翼,因与国境以外邻近地区关系密切,是下一步北方地区考古工作的重点^⑧。他还将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以后的中国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把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划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与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和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并立^⑨。1986年在沈阳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的开幕词中,苏先生对东北古文化发展的特点有一段形象的比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东北地区古文化的发展曾经历过类似最近长江探险队通过金沙江那段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险滩,那样波涛起伏的场面”^⑩。

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重建中国史前史”、“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和“环渤海考古”等重大课题的提出,苏先生曾多次强调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及其从史前时期直到满族起源所起的特殊作用,并逐渐将东北区从整个北方区中有所区分。

1993年,苏先生为《沈阳文物》创刊号题辞:“沈阳市有‘两宝’,一个是七千年前的新乐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遗存,一个是三百年前清故宫及清陵所代表的早期清政权文化遗存。它们凝聚着这一方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深入一层讲,一是鲜明的个性,二是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明确指出了东北渔猎文化的特性和优势^⑪。

1994年他在同日本富山电视台内藤真作社长关于环渤海——环日本海考古的谈话中,又将这种具有开拓精神的古文化范围扩大到“白山黑水”和两个海(指从环渤海到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时代从清开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燕亳”^⑩。

大约同时,他在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分为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三模式”时,对满族开国史有一段精彩论述:

“就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续生型’国家及其对中华统一民族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中国最后一个帝国——清帝国,更具有典型意义。起源于东北地区一角的女真——满族曾经是一个发展较落后的,长期处于‘四夷’地位的中华民族成分。努尔哈赤追溯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就说,由他上溯六世即肇基王业之祖,在女真人社会内部分散的奴隶主政权间经历过无数次的兼并重组之后,才在距沈阳东北方向二百来公里的新宾设立了帝王之位,建立了后金国,成为一方的大国。努尔哈赤又进行了大量的兼并征战,到皇太极时代的1636年,改后金为大清,建立了满、蒙、汉三个八旗,为入主中原作了充分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人才各方面的准备,终于完成了清帝国的统一伟业,这是秦汉帝国以后新一轮的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帝国,几次重复华夏族早期从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的翻版”^⑪。

对此,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又作了重要补充:

“满族开国史有特殊意义,不可小看。起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是渔猎民族,从黑龙江新开流文化到沈阳新乐文化都以渔猎为特色,两者不能说没有关系。渔猎民族天生没有国界概念,却能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保持协调一致,这是渔猎民族优于农牧民族的地方。满族一开始就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善于总结历代经验,敢于说长城内外是一家”^⑫。

以上所引,既可见苏先生对东北古文化区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也是我们研究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

目前,对东北文化区的认识,当然首先是它的范围、地域特征、分区、文化序列等基础性问题。

东北考古文化区的范围,不限于现行行政区划的东北三省。这个古文化区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西以大兴安岭与蒙古草原相连接,向西南已越过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南部和东南部以渤海、黄海和日本海通往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则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延伸。其地理范围,既包括现东北三省即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也涉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与河北省北部及京津地区,还可联系到广大的东北亚地区。

东北文化区的共同区域特点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较为成熟,那就是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都以一种饰各类压印纹的平底筒形陶罐为主要特征,并以此联系着广大东

北亚地区,而且与筒形罐同时共存的都有细石器,不少遗址还出有玉器。当然,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虽有共同的地域特征,但它们的发展也并非只有一条线,有的指出,辽西的查海——兴隆洼文化、辽东的新乐文化、松嫩平原的昂昂溪文化和三江平原的新开流文化就可能是各有渊源的^⑮。

关于东北文化区的分区问题。大贯静夫从整个东北亚地区考察,初分为东西两区^⑯;张忠培分作八个大区,即燕辽区、辽东区、吉长区、松嫩平原区、三江平原区、牡丹江绥芬河区、图们江区和浑江鸭绿江区,并以沈哈铁路分界,将东北区概括地分作面向海洋的东半部和面向大陆的西半部^⑰。我们可以张先生这一划分作为标准,或考虑到东北区自身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在八大区的基础上将东北文化区分为四区,即东和东北、西和西北、南、中四大块。东部和东北部有号称白山黑水的长白山区、三江平原和广阔的黑龙江流域,有茂密的森林,历代保持了以渔猎为主的经济形态,代表着东北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南部属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系的东端和环渤海地区的北翼,又可称辽西区或燕辽文化区,这里的丘陵山谷属蒙古草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东北文化区内最先与农业区接触,而较早出现农耕的一个地区,也是东北文化区与中原文化接触交流的前沿地带;东北地区的西部和西北部以大片草原通往蒙古草原,从而与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接触较多,较早发展了牧业;中部为著

名的东北大平原,有诸大山脉作屏障,有辽河、松花江等大小河川贯穿其间,是诸经济形态过渡地区和古文化发展、消长的舞台。特别是东北地区多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川,是为同黄河流域交流的天然通道和枢纽。

东北区的古文化不仅已可分区,而且在多数地区已建立起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序列,这不仅是指文化积累较丰富,考古工作也相对较多的辽西区,就是辽东半岛区、吉黑地区,也已逐步有序列可寻。由于自身文化发展序列的初步建立,在与中原地区古文化的比较中,可以较有效地解决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同步与不同步,进而发展水平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把辽东地区的青铜文化作为新石器文化对待,现仍有把吉黑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对待的情况,考虑到东北亚广大地区如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列岛都有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文化,吉黑两省都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存,如三江平原的新开流文化、松嫩平原的昂昂溪文化等,有的如左家山遗址已有系统序列,这与同属于东北文化区的辽西区、中原地区以至全国其它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的早、中、晚三个阶段是大体对应的^⑱,黑龙江省的松嫩平原还发现了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和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属于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小拉哈文化^⑲,而且有早期青铜时代小拉哈文化——商周时期白金宝文化——战国前后的汉书二期文化的系统发展

序列,这与东北南部的辽西区以至中原地区也是大致同步发展的,故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应同中原地区一致起来。当然,东北区内辽西区与其它大部分地区之间,以及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也必然有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一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平衡性越来越显著,这主要表现为辽西地区一直与中原地区大体同步发展,而辽东以及东北其它地区则相对后进。

随着东北文化区的初步确立和区系中这些基础性问题的初步明确,也必然不断提出一些新问题,主要是如何看待东北区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文化发展进程和特点问题;文化相对发达且农业比重加大的辽西地区与东北文化区的关系及其地位问题。

一般以为,渔猎经济相对于农业经济为落后,必然要被农业所代替,这已是普遍规律,也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主要标志之一。但东北文化区却有所不同,这个文化区渔猎经济的固有传统,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及更晚,并表现出一定优势:首先,这是对旧石器上百万年积累的文化传统的直接继承,而不是如农业部落那样更多地表现为对渔猎文化的替代;渔猎经济以与自然界协调为本色,这是过度开发土地而破坏自然的农耕文化所不及的;渔猎民族活动面远较农业民族为大,并无国界概念,这又较固守本土而相对封闭的农耕文化更趋开放,在文化交流中也更具优越性。所以张忠培先生以为依靠渔猎经济的提高也可以实现由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转变,干志

耿诸先生认为渔猎文化也可以产生上古文明,都是很有见地的^②。

关于东北文化区确立后的辽西地区。作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主要文化区之一的辽西地区,包括辽宁省的朝阳、阜新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地区在内,曾被视为中原粟作文化区中的燕辽文化区^③,如果考虑辽西地区古文化、特别是辽西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东北文化区的密切关系,首先应考虑它属东北文化区。张光直先生已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他在《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1997年)一文中说:“黑龙江——大兴安岭这一区域的文化,与红山文化很为近似,其近似之程度可能要超过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近似的程度”^④。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辽西地区目前所确立的史前文化以至早期青铜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东北渔猎文化区的特征。已知辽西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查海——兴隆洼文化,饰压印纹筒形罐几乎是唯一特征,常见细石器、渔标等工具,马鹿和野性较强的猪都较多见,还有孢、鱼骨和野生胡桃楸果核等,由成排房址组成的完整聚落可能说明已有定居农业,不过狩猎采集在查海——兴隆洼文化中当占有主导地位。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者也认为:“在兴隆洼各期房址的居住面上均散布有大量的鹿、猪为主的动物骨骼,有的还出有成组摆放的动物头骨。无疑,狩猎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⑤。查海、兴隆洼、白音长汉以至辽东地区的新

乐遗址等,房址内居住面上陶器等生活用具和石磨盘、石磨棒等生产工具摆放如初,从聚落考古的概念分析,可以认为这是居住址具有强烈季节性的表现,这也应同渔猎经济所具有的一次性连续定居时间较短的居住形态有关。此外,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考古材料也证明,发达的渔猎经济也可以维持大型聚落的存在^④。辽西地区从查海——兴隆洼时期起所处的阔叶林和针叶林相间的森林草原型自然环境及有关遗址出土的野生果核、大量野生动物骨骼也很能够说明这一点。

关于查海——兴隆洼文化玉器。查海、兴隆洼、白音长汉等遗址都普遍出有玉玦、玉匕形器等玉器,从它们特定的形制看,其制作和使用都已经专门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的情况,是该文化中最为先进的一种文化因素。近年继辽西查海——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玉器确认之后,吉黑两省也有 40 多处出玉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点,且多与红山文化玉器有共同特点,或被称为“红山系玉器”^⑤。俄罗斯远东地区滨海与日本列岛沿日本海一线也见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玉器,其中的玉玦、玉匕形器,与查海——兴隆洼文化所出形制与组合都十分相近,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遗址也见这种类型的玉匕形器。尤其是日本北海道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里发现了玉饰件^⑥。对此我们曾论证,玉器的起源原本就与渔猎文化有关,因为从玉器的出现过程看,有两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从石中最终将玉分辨出来,一是对玉的特定加工方法。古人

从石中选择出质地、硬度、色泽都适中的“温其如玉”的玉石,赋予它以社会化、人格化的功能,是需要对玉的特性有很深刻的认识的。同时,为了使玉的这些特征得以充分表现出来,对玉的加工采用了十分耗时费力的以砂为介质的间接磨擦法,而所用的砂质的硬度必高于玉,这些都是人类在漫长实践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而这两个方面都同细石器的发达有着直接关系^⑦。因为对优质石料的鉴别、选择,对石材结构、性能的熟悉,是在对细石器的制作和使用过程中达到高峰的,这也为认识和加工玉石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技術条件。可见,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过程。

查海——兴隆洼文化之后的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耕,但采集、渔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出有较多细石器,野生动物鹿、獐,以及居住址文化堆积普遍较薄所反映的定居相对性等,都很能够说明这一点。压印纹筒形陶器的发达、玉器上大量且熟练地使用虎、熊、野猪等野生动物题材,也强烈地反映了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特色;赵宝沟遗址更出有大量马鹿和斑鹿,还有貉和獾、熊骨,及河蚌壳、鱼类、鸟类等,这同遗址普遍出土的细石器是相应的,负责赵宝沟遗址动物骨骼鉴定的黄蕴萍认为,“狩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人类获取肉食的主要生产活动。还从事捕捞作为肉食的补充。”并从赵宝沟遗址的动物

群推测,“当时赵宝沟及其邻近的努鲁儿虎山区有茂密的森林”^⑧。就是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定居农业已很发达,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东北地区的文化传统,如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多见细石器,尤其是喜用石头作建筑材料,以石筑山城作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山地民族特性等。有人以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东北其它地区青铜文化独具特征的筒形陶鬲与当地新石器时代盛行的筒形罐有关,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观点^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又确有一种横耳直筒形鬲,可能更接近于辽东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陶鬲,这应是东北地区所特有的一种在新石器时代筒形陶罐的原型基础上诞生的陶鬲。

辽西地区属于东北渔猎文化区,还可以从辽西区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又一中心区内蒙古中南部相比较中加以理解。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有着与辽西区大体相对应的文化序列,即相当于仰韶文化前后期的阿善一期文化和阿善二期文化(包括海生不浪文化和庙子沟文化),相当于龙山文化前后期的老虎山文化到夏商时代的朱开沟文化^⑩。这两个地区的联系表现为,辽西区的筒形陶罐曾波及到内蒙古中南区,在庙子沟等文化中常见到饰绳纹的筒形陶罐,内蒙古中南区盛行的几何形彩陶则为辽西区的红山文化所接受;到了青铜时代,辽西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三袋足陶器突然出现并迅速取代当地新石器时代流行数千年的筒形陶罐,显然与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首先出现的原始鬲的影响有关,而辽西地区商

周之际魏营子文化花边鬲的盛行,则可能和朱开沟文化较早出现的花边鬲有关^⑪。不过,这两个地区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史前文化和青铜文化虽也呈现出自身特色,某些阶段地方特色还较强,如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阶段的阿善二期、庙子沟、海生不浪诸文化,但从整个史前时期到青铜时代诸考古文化发展过程看,这一地区却总是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不断北渐的地区,农牧的交错和彼此的消长最先在这里得以表现,而辽西地区因有东北地区的大背景而显得相对稳定。这里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魏营子文化等,是在大幅度吸收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先进因素,而不断形成和发展了自身地区特色的。辽西地区从未发现过典型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表明:东北文化区为不同地区文化间的交融、保持和发展地区文化特色提供了优良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不必再进行文化的替代。两个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发展模式,更突出了辽西地区的东北文化特性。

不过,辽西地区又处于东北文化区面向中原文化区的前沿,是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这里最先与中原农耕文化相接触,也最先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渔猎文化虽在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和经济稳定性上不如农耕文化,但因活动地域广阔和与自然界协调而培育出的开放性格,在文化交流方面是固守土地而相对封闭的农耕文化所不及的。关于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辽西地区这种结合的成果,以红山文化表现最为典型。

早在红山文化发现之初的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梁思永、裴文中、尹达都对红山文化内涵中所显示的长城南北两种文化因素表示了特殊的关注。梁思永最早注意到长城南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差异,提醒要注意“沿边文化接触区域”^②,裴文中称这是南北方文化交流形成的“混合文化”^③,尹达接受梁思永的建议,在他于五十年代初所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认为这是北方文化与仰韶文化结合产生的一种新文化,并提议定名为“红山文化”。他说:“就红山后这一新石器时代遗址陶器和石器的特点分析,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之后所产生的新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是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④。一种史前考古文化表现出两种文化如此明显的结合,而且是中国长城地带以南和以北两种古文化的结合,这在史前文化中是极为罕见的,其中必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萦绕在有识者脑海中的这一问题终于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而被揭开。以玉雕龙为代表的玉器群和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南北文化结合的成果。就红山文化的陶器而言,不仅有具东北地区特征的压印纹夹砂筒形陶罐与具仰韶文化特征的泥质彩陶器共存,而且在彩陶中又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简化玫瑰花图案与具当地特征的龙鳞纹图案的结合,表现出红

山文化在这一南北文化的交汇中,既不是不同文化间的替代,也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合体,而是两种文化融为一体。苏秉琦先生曾对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同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作了比较,形象地称前者为“兄弟”关系,而后者是“邻居”关系^⑤。然而,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这一成功结合,却是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和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群体间的结合,是东北地区渔猎文化吸收农耕文化先进因素的结果。以“花(仰韶文化)与龙(红山文化)”为标志的这一文化交汇以及作为这一文化交汇后果的坛庙冢的出现,自然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产生联想:

“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⑥。所以,这一南北不同文化间的结合,不仅是西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原动力,而且也是一种观念上的认同。如果这是东北渔猎文化区吸收中原农耕文化区先进因素的结果,那么对渔猎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史上的作用,就应予以重新估计。

由于辽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属于东北区,背景是渔猎文化及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那就提出了对这一地区历史上

长期持续的农牧间的文化关系如何理解?考古发现证明,游牧文化大约是从青铜时代才逐步在辽西地区出现的,商周之际前后的“北方式青铜器”首先进入辽西,并迅速向辽东地区推进^⑩,不过,崛起于白山黑水及其周围地区的诸民族,仍然活跃于东北大地,从此形成了东北地区农、牧、渔猎共存,东、西、南不同地区各有侧重的局面,辽西地区也长期以来担当了中原文化向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传播的使者。

以上对东北文化区的自然、人文背景的论述和把辽西地区放在东北文化区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得出的一些新认识说明,东北文化区的确立,对进一步探索包括辽西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区诸考古文化的渊源、发展道路、特点、它们与邻区的文化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华文化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作用,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导向意义。而且不仅史前时期,探索东北地区历代诸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直到满族的兴起,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附记:本文是根据在1998年8月赤峰召开的北方民族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论东北文化区及其前沿》(发表于《文物》1999年第8期)和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8年考古汇报会上的发言,于1999年9月改写而成的。此后,于2001年8月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的《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其意义》一文中又有进一步论述。本文这次发表前,看到国际日本文化中心安田喜宪教授《从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动看

文明的诞生》一文(发表于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文中将畜牧——农耕文明与狩猎——渔捞文明加以区别,并提到以狩猎——采集——渔捞为中心的绳纹文明,可供参考。

注 释

- ①《东北文化——白山黑水中的农牧文明》,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
- ②秋山进午:《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世界の大遗迹·9. 古代中国の遗产》,讲谈社,1988年;甲元真之:《长江と黄河——中国初期农耕文化の比较研究》,《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40,1992年。
- ③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1994年。
- ④郭大顺:《玉之路与绳纹人的文明信息》,《富山市日本海文化研究所所报》第21号,1998年;又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考古合作报告书》第211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 ⑤郭大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 ⑥林沄:《我的学术道路》,《林沄学术文集》第1~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⑦苏秉琦:《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物》1984年第12期。
- ⑧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31、3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⑨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 ⑩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8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⑪《沈阳文物》创刊号,1993年。

- ⑫苏秉琦:《与日本富山电视台内藤真作社长谈话》,《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4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⑬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6页,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 ⑭同⑬136、137页。
- ⑮林沄:《两个现象,一个假设》,《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 ⑯大贯静夫:《东北亚洲中的中国东北地区原始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⑰张忠培:《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1996年8月24日在‘渤海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 ⑱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 ⑲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肇源县小哈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 ⑳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上册第5页,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叶启晓、干志耿、殷德明、孙长庆:《东域访古》,《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 ㉑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 ㉒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1994年1月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论文,收于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1~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 ㉓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2·远古时代》第353页;杨虎、刘国祥:《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97年第1期;袁靖:《关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1994年第10期。
- ㉔参见《世界の大遗迹·10·日本、古朝鲜文化の精华》,讲谈社,1988年;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杨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000~20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大甸子》附录二,科学出版社,1996年。
- ㉕孙长庆、殷德明、干志耿:《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兼论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起源》,考古学文化论集(4),文物出版社,1997年;邓淑苹:《谈谈红山系玉器》,《(台)故宫文物月刊》第189期。
- ㉖烟宏明、北沢実、寺崎康史:《日本国北海道地方における旧石器时代及び縄纹时代前半の玉类》;邓聪编:《东亚玉器》第322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 ㉗同⑤。
- 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㉙冯恩学:《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 ㉚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 ㉛崔璇:《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之际河套地区与燕山南北的文化联系》,《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韩嘉谷:《花边鬲寻踪》,《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魏坚、曹建恩:《庙子沟文化筒形罐及相关问题》,《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 ㉜《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40、144页,科学出版社,

1959年。

③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第130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

④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第1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⑤苏秉琦:《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

言)》,《中原文物特辑·论仰韶文化》1986年。

⑥苏秉琦:《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9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⑦郭大顺:《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合刊。

查海遗址 1992 ~ 1994 年发掘报告

辛 岩 方殿春

查海遗址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 2.5 公里处(图一), 这里是绕阳河一支流的发源地, 海拔高度 297 米, 自然坡度较平缓。遗址坐落在一漫丘南坡台地上, 现存面积 1 万多平方米。查海遗址自 1986 ~ 1994 年先后进行过七次不同规模的考古发掘, 其中 1986 ~ 1990 年间四次发掘简报已经发表^①, 而 1992 ~ 1994 年三次发掘所获考古资料, 仅在《中国文物报》分别作过报道^②, 现将此三次考古

发掘资料报告如下。

一、发掘概况与地层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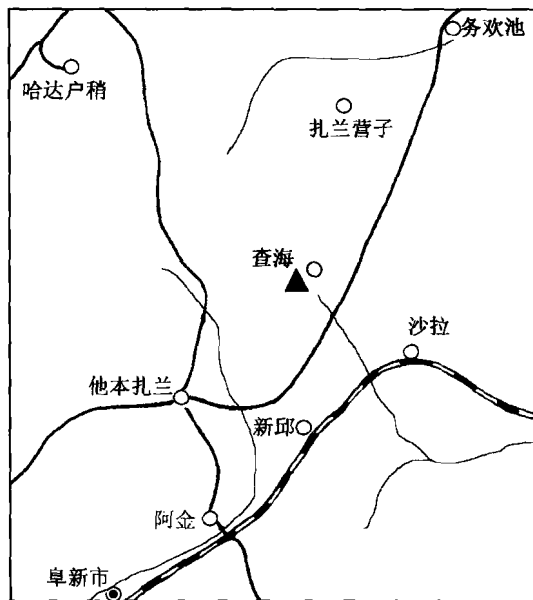
1992 ~ 1994 年三次连续性发掘工作, 是在遗址的 I、II 区内进行的, 揭露面积 6 000 平方米。发掘房址 42 座、窖穴(不包括室内窖穴)与灰坑 34 个、室内墓葬 4 座、聚落居住区中心墓地 1 处(包括墓葬 10 座)和大型“龙形堆石”1 处, 另外在 I 区北部清理出一段聚落围沟。这些遗迹内出土了一大批陶、石、玉器等珍贵文物, 尤其以饰“蟾蜍”、“蛇衔蟾蜍”陶罐, 以及大型“龙形堆石”引人注目。发现了房址之间的打破关系, 以及 II 区西北部一组以出土素面陶器为主的房址等重要遗迹, 为前几次发掘中所未见。这些新的考古资料, 为研究查海文化内涵与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图二)。

查海遗址的地层关系较单纯, 现以 II 区 T0315、T0215 北壁剖面及 I 区 T0506、T0606 北壁剖面为例(图三)。

II 区 T0315、T0215 北壁剖面:

第①层: 耕土层, 厚 15 ~ 20 厘米。

F26 开口于此层下。



图一 查海遗址位置示意图